

THE
CONVENTION
OF THE
JEWISH
PEOPLE

虚构的

犹太民族

SHLOMO SAND

[以色列] 施罗默·桑德 著

王宗兴 张蓉 译

上海三联书店

虚构的 犹太民族

[以色列] 施罗默·桑德 著

王崇兴 张蓉 译

SHLOMO S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JEWISH PEOPLE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虚构的犹太民族 / (以) 桑德著 ; 王崇兴 , 张蓉译 .

—上海 : 上海三联书店 , 2012.8

ISBN 978-7-5426-3823-6

I. ①虚… II. ①桑… ②王… ③张… III. ①犹太人 - 民族历史
- 研究 IV. ① K38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77138 号

虚构的犹太民族

著 者 / [以] 施罗默·桑德 (Shlomo Sand)

译 者 / 王崇兴 张蓉译

策 划 / 严搏非

责任编辑 / 黄 韬

特约编辑 / 李伟为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版 次 /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960 × 1300 1/32

字 数 / 367 千字

印 张 / 13.8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3823-6/k.177

定 价 / 49.00 元

谨以此书纪念那些
曾到过这片土地和被迫离开此地的流亡者们

英文版序言

本书最初是用希伯来语写成。实际上,我的母语是意第绪语(Yiddish),但希伯来语始终是我欣赏的,也许还是我梦寐以求的语言。没错,它也是我写作的语言。我选择在以色列出版此书,因为我最初预期的读者是以色列人,是那些视自己为犹太人和那些被界定为阿拉伯人的人们。我的理由十分简单:我生活在特拉维夫(Tel Aviv),我在那里教授历史。2008年初,当本书初次面世之时,人们对它的反响有点儿奇怪。电子媒体极为好奇。我受邀参加了许多电视和广播节目。新闻记者也关注我的研究,而且多半以赞许的方式加以关注。与此相对,“被官方认可”的历史学家团体的代表们,则将满腔学究式的怒火倾泻到本书上面,一些易激动的博客作者甚至把我描绘为人民的敌人。也许正是这种比照促使读者让我得到了所渴求的事物——本书连续十九周停留在畅销书排行榜上。

欲理解上述事态的发展情况,你必须现实地看待以色列这个国家,抛弃任何赞同或反对的偏见。我生活在一个相当奇怪的社会之中。正如本书结束的那章所展现的——令许多书评者恼怒——只要以色列视自己为一个“犹太民族”的国家,而非代表它被承认国土内(不包括被占地区)所有公民的一个共同体,以色列就不能被称为民主国家。以色列的法律实

质表明,在 21 世纪的初始阶段,国家的目标是服务于犹太人而非以色列人,是为想像中那个民族的后裔,而非为生活在它之中和言说它的语言的所有公民提供最好的条件。事实上,犹太母亲所生的任何孩子,都可以拥有两个最好的世界——自由地生活在伦敦或纽约,同时自信以色列是属于他们的,即便他们不希望生活在它的主权之下。然而,不是犹太人所生的、生活在雅法(Jaffa)或拿撒勒(Nazareth)的每个人,却会感到他们出生的国家从未属于他们。

但是,在以色列存在一种罕见的自由多元主义,这种自由多元主义在战争时期会削弱,而在和平年代则运行相当良好。到目前为止,在以色列,对文坛大事表达一系列政治意见、有阿拉伯人政党参加议会选举(以他们不质疑国家的犹太特性为条件)以及批评民选的当局,是可能的。一些自由主义的自由——比如,出版自由、表达和结社自由——受到保护,公共场所多样化且安全可靠。这是本书会出版并 2008 年得到了热烈反响且引起了真诚争论的原因所在。

此外,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已经放宽了对民族神话的严格解释。较为年轻的一代新闻记者和批评家们不再重复其父辈的集体主义的精神气质,且追求在伦敦和纽约蕴育成的社会模式。全球化已使它那进攻性的魔爪嵌进了文化领域,甚至是以色列的文化领域,且在此过程中,逐步摧毁了培育出“建国者一代”的神话传说。目前,在各种学术机构中,人们感受到了一种被称为后犹太复国主义的智识浪潮(post-Zionism)。尽管它还处于边缘,但已经创造出了不寻常的关于过去的图景。社会学家、考古学家、地理学家、政治科学家、文献学家,甚至是电影摄制者都一直在挑战居主导地位的民族主义的主要术语。

但上述那股信息流和那些洞见还没有影响到某一学科所处的高原。在希伯来语的学校和研究院所中,该学科被称为“犹太民族史”。在那些机构中,没有就历史学本身而言的那种科系,但却有通史科系——比如我所属的那个科系——和单独的犹太(以色列)史科系。无须说,我的最严厉的批评者都来自后者。除了指出小的错误之外,他们主要抱怨我无权

探讨犹太历史编纂学,因为我的专业领域是西欧。这类批评不会被用来针对其他研究犹太历史的通史学家,如果没有偏离统治性思想的话。在所有重构犹太民族的过去的范围内,“犹太人民”、“祖先的土地”、“流亡者”、“大流散(diaspora)”、“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aliyah)”、“犹太人的土地(Eretz Israel)”、“救赎之地”等等,都是关键术语,拒绝采用它们就会被看作是异端。

在开始写作本书之前,我已经意识到了上述所有一切。我预料到我的攻击者们会声称我缺乏关于犹太历史的适当知识,不能理解犹太民族的历史惟一性,无法明晓犹太民族的《圣经》起源,会否定犹太民族永恒的一体性。但对我来说,在特拉维夫大学工作生活,那里收藏有大量关于犹太历史的书卷和文献,而我不花时间去阅读和研究它们,似乎这才是对我职业的一种背叛。像某位有声誉的教授那样,到法国和美国旅游,搜集有关西方文化的资料,享受学术研究的权力和宁静,这当然是惬意的。但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参与塑造我生活其中的社会的集体记忆,我感到直接推动上述任务的最敏感方面乃是我的义务。

诚然,我的研究使人想到的有关犹太民族史和人们通常理解历史的方式——不仅在以色列内部而且在更广泛的世界中——之间的不同,使我和我的读者感到同样的震撼。一般说来,教育体系教导我们在已经完成了思考之后,才开始写作——意味着你在开始写作之前应该知道你的结论(那就是我获得博士学位的方式)。但现在,在我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一再地感到困惑和震惊。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和其他人,在民族史领域挑起了一场概念革命,而当我一开始使用他们的方法,那些在出乎意料的方向上引导我的洞见,就会对我在研究中偶遇的资料做出解释。我要强调的是,我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新发现——以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的历史学家已经揭示了几乎所有这些材料。不同之处在于,一些要素没有被给予足够注意,其他要素则被迅即扫入历史学家的垃圾堆里,还有一些要素则被“忘却”,因为它们不符合演化中的民族认同之意识形态的

需要。令人十分惊异的是,在职业研究那个有限的圈子内,本书所引用的大部分资料一直为人所知,但却始终如一地迷失在通往公共记忆和教育记忆这个领域的路途之上。我的任务是以一种新的方式组织历史资料,重新采用旧文献,且不断地重新检验它们。这些资料引导我得出一些结论,而这些结论则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我年轻时被教授的叙事。

不幸的是,我同事——在以色列的历史教师们——中很少有人感到从事揭露关于过去的常见谎言这项危险的教育使命是他们的义务。如若不写这本书,我可能不会继续生活在以色列。我不认为书籍能够改变世界,但当世界开始改变之时,它会寻求与众不同的书籍。我可能天真幼稚,但我的希望是眼前的这本书会成为那类书籍中的一本。

特拉维夫,2009

绪论：记忆的重负

民族……就是由对其祖先的共同谬见和对其邻人的共同厌恶所联结在一起的一群人。

——卡尔·多伊奇，民族性和它的替代者，1969

我认为，如果不能哭喊，如果没有一点儿酒精和流行音乐从头到尾的相助，我不可能写成我确已写成了的这部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著。

——厄内斯特·盖尔纳，“对批评者的回复”，1996

本书是一部历史著作。不过，它将以若干个人故事来开始。像所有传记性作品一样，这些故事需要自由的有想像力的描述来给予它们生命。像这样来开始写作，会比读者最初想像的要更少奇异之处。学术研究通常受个人经历的刺激，这不是什么秘密。这些经历往往隐藏在层层理论之下；在本书，一开始就提供一些经历。在作者通往历史真相，通往一个理想的目的地——他意识到，没有人曾真正抵达——的历程中，这些经历将为作者提供启动把手。

个人记忆是不可靠的——我们不知道写作它的墨汁之细微的词义差别——由此，人们应该把对下面初遇的故事的描绘看作是不严谨的，部分是虚构的，尽管其他任何传记性作品都是如此。至于这些故事同本书核心主张之可能令人烦恼的关联，随着故事的展开，读者将会有所发现。有

时候,下述故事的语气确实是冷嘲热讽,甚至是忧郁悲叹。但冷嘲热讽和忧郁悲叹自有它们的用处,对于一本试图分解历史根源,改变以色列人认同政治之特性的批判性著作来说,它们连在一起可能是一种适宜的表达方式。

迁移中的身份

第一个故事——两移民的祖父

他的名字叫沙勒克(Shulek)。后来,在以色列他被称为绍尔(Shaul)。1910年,他出生在波兰的罗兹(Lodz)。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他父亲死于流感,他母亲到罗兹附近的一家纺织厂工作,当了一名工人。在犹太人地方社区的帮助下,三个孩子中的两个被送给他人收养,只有最小的沙勒克留在家里。他在一所犹太教小学上了几年学,但他母亲经济上的窘况迫使他在很小的年龄就浪迹街头,并开始从事与纺织品加工过程有关的各种工作。以上就是沙勒克在波兰的纺织品生产中心罗兹所经历过的生活。

出于相当寻常的理由,这个年轻人抛弃了他父母的古老信仰。当他母亲因其父亲去世而陷入困顿之时,当地的犹太教堂命令她坐在聚会的后排座位上。在那个传统社团中,等级制占支配地位。金融资本的减少几乎总是导致象征(symbolic)资本的迅速减少,由此,这位母亲与应受尊重的社会地位的距离反映在她同神圣的《托拉》(Torah)的距离上面。她的儿子注意到了被排斥的势头,且发觉自己被逐出了祈祷房。在较大城市的犹太居民区,年轻人丧失信仰变得普遍起来。一夜之间,年轻的沙勒克也发现自己没了家园,没了信仰。

但这种状态没持续多久。他加入了共产党,这一情形是一种时尚,它使他与波兰社会的文化和语言多数相一致。沙勒克很快成为了一个革命的激进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的构想充溢着他的想像,强化了他的精神,推动他阅读和思考。尽管为了谋生,他做着费力的工作。共产党成了一个

避难所。不过，因为政治煽动罪，这个温暖且充满活力的避难所不久就把他投入了监狱。他蹲了六年监狱，在此过程中，他从未完成学校教育，但他的教育程度却得到了相当大的扩展。他没能消化马克思的《资本论》（*Das Kapital*），但却开始熟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通俗作品，他没能实现他母亲要他进入一所犹太高等学校的愿望，他成为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1939年12月的一个寒冷的日子，沙勒克在罗兹中心街道目睹了三位犹太人被绞死——这是在街道附近啤酒吧中一些一直在喝酒的德国士兵的惊人举措。几天后，他、他年轻的妻子和她的妹妹，同向东奔向红军的难民洪流一起被驱除。沙勒克没有带着他母亲一起出来。他以后会说她已年老体弱；事实上，她那时是50岁。当犹太人区的居民开始在缓慢而笨重的毒气卡车——更高效的毒气室之前的原始灭绝技术——中被消灭的时候，她身在其中，她的年龄大概就是50岁，而且也是穷人。

当逃难者到达苏占区，沙勒克知道最好不要透露他是一名共产党员：斯大林最近消灭了波兰共产党的领导人。沙勒克反倒以一种旧的新身份——以公开承认的犹太人的身份——跨过了德国和苏联边界。当时，苏联是惟一个愿意接受犹太难民的国家，尽管它把他们中的大部分打发到了它的亚洲地区。沙勒克和他妻子幸运地被派送到了遥远的乌兹别克斯坦。他的小姨子受过教育，且会讲几种语言，享有了被允许留在文明的欧洲的特权。但不幸的是，那里还没有被称为犹太教-基督教的地区。因此，正是在1941年，她落入了纳粹的魔掌，被送入了焚尸炉。

1945年，沙勒克和妻子回到波兰，但即便在没有了德国军队的情况下，这个国家仍旧拒绝接受犹太人。这位波兰共产党员再次处于没有家园的境地之中（除非我们把共产主义运动视为家园，尽管共产主义运动给他造成各种各样的苦楚和忧虑，他对它却始终忠贞不渝）。他和妻子及两个小孩儿，发现自身处于巴伐利亚山脉中为难民们提供的帐篷中。在那里，他遇到了他的一位哥哥。不像沙勒克，他的这位哥哥不喜欢共产主义，而赞同犹太复国主义。历史以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微笑观看着他

们的命运：那位哥哥，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得到了一份移民到蒙特利尔的签证，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而沙勒克和他的小家庭则由犹太人服务机构转移到马赛。在1948年底，他们由马赛乘船到了海法。

在以色列，沙勒克以绍尔的身份生活了许多年，尽管他从未成为一名真正的以色列人。就以色列人的身份来说，他的身份证甚至没有把他归入其中。身份证根据民族属性和宗教把他限定为犹太人——自从1960年代以来，这个国家为所有公民登记一种宗教，包括确定的无宗教信仰者——但沙勒克总是更像是一位共产主义者而非一个犹太人，更像一个意第绪主义者而非一个波兰人。尽管他学会了用希伯来语交流，但他不太关注语言，且持续地与家人和朋友讲意第绪语。

沙勒克怀恋东欧的“犹太人的家园(Yiddishland)”，怀念战前那里激昂和骚动的革命观念。在以色列，他感到在窃取他国人民的土地，尽管这不是他的作为，但他一直不断地把这看作是偷窃。他明显的疏离不是来自看不起他的在以色列土生土长的犹太人(Sabras)，而是来自当地的气候。利凡特(Levant)炎热的空气不适合他。它只是强化了他对覆盖着罗兹街道厚厚白雪，对已缓慢地融入他记忆中直到他最后闭上双眼的波兰的白雪的期盼。在他的坟墓边，他的老战友们唱起了“国际歌”。

伯纳多(Bernardo)于1924年出生在加泰罗尼亚的巴塞罗那。若干年后，他被称为道夫(Dov)。像沙勒克的母亲一样，伯纳多的母亲终其一生都是一位笃信宗教的妇女，尽管她去的是基督教礼拜堂而非犹太教教堂。不过，伯纳多的父亲在早年就放弃了对灵魂的任何特别的专注，且像在反叛的巴塞罗那的其他许多金属加工工人一样，成为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西班牙内战之初，无政府的—工联主义的合作组织支持年轻的左派共和国，而且在一段时间里实际上控制了巴塞罗那。但是右翼的弗朗哥分子的武装力量很快就到达了这座城市，在从巴塞罗那街道的最后撤退中，年轻的伯纳多和他父亲一道战斗。

内战结束后几年，伯纳多被征募进弗朗哥的军队之中，这没能软化他

对这个新政权的感情。1944年，作为一个身带武装的士兵，他逃亡到比利牛斯山。在那里，他帮助其他佛朗哥政权的反对者跨越国界。与此同时，他热切地等待着美国军队的到来，以击败这个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残忍的同盟者。令他绝望的是，民主的解放者们甚至都没有进行尝试。伯纳多别无选择，只好跨越他自己的边界，成为了一个无国家的人。在法国，他当过矿工，而后他偷乘一艘船舶逃离法国，希望能抵达墨西哥，但在纽约被捕并被带着镣铐遣返回欧洲。

这样，在1948年，他还在马赛的一家造船厂工作。5月的一个夜晚，他在码头临区的一家咖啡馆里遇到了一群满腔豪情的年轻人。这位年轻的金属加工工人，仍旧梦想着巴塞罗那的那些革命的合作者们的人性之美，且开始确信新的以色列国中的基布兹(Kibbutz)是他们天然的继承者。在与犹太教或犹太复国主义没有丝毫联系的情况下，伯纳多搭乘一艘移民船只，到达了海法，并被迅速派往在拉特仑(Latron)山谷的前线。在战斗中，他的许多战友都阵亡了，但他却幸存下来并立刻加入了基布兹，正如他在马赛的那个春日梦想要做的那样。在基布兹，他遇到了他生命中的女人。和其他几对情侣一起，在一场快捷的仪式上，由一位拉比主持，他们结为夫妻。在那些日子里，拉比还是开心地提供着这类服务，没有问任何不相干的问题。

内政部很快发现犯下了一个严重错误：现在以道夫之称而为人知晓的伯纳多，不是一个犹太人。尽管不能取消他的婚姻，但道夫被传唤参加一个正式会议来澄清他的真正身份。在政府办公室，他被命令坐在一位带着大的黑色无沿便帽的官员对面。那时，宗教-犹太复国主义政党米兹拉希(Mizrahi)掌控着内政部，该党审慎而犹疑。它还没有坚持“民族”分界或身份排斥政治。

两个人之间的谈话大体如下：

“先生，您不是一个犹太人”，官员说。

“我从来没说我是”，道夫回答道。

“我们不得不改变您的登记证”，官员冷淡地说。

“没问题”，道夫表示同意。“请便。”

“您的民族属性是什么？”

“以色列？”道夫提道。

“没有这样的民族属性，”官员声明。

“为什么？”

“因为没有以色列的民族身份”，这位部门官员叹息地说。“您在哪里出生？”

“在巴塞罗那。”

“那么我们写‘民族属性：西班牙人’。”

“但我不是西班牙人。我是一个加泰罗尼亚人。我拒绝被归为西班牙人。这是我父亲和我在1930年代为之战斗的事情。”

那位官员挠了挠脑袋。他不懂任何历史，但他确实尊重人民。“那么，我们写‘民族属性：加泰罗尼亚人’。”

“太好了！”道夫说。

这样，以色列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官方承认加泰罗尼亚人民族属性的国家。

“哦，先生，您的宗教信仰是什么？”

“我是一个世俗的无神论者。”

“我不能写‘无神论者’，以色列国家不承认这样一类信仰。您母亲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呢？”

“我上次见到她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天主教徒。”

“那么，我写‘宗教信仰：基督徒’”，那位官员如释重负地说道。

但是道夫这位通常冷静的人，则变得越发不耐烦。“我不要携带一份说我是一个基督徒的身份证。它不仅与我的原则相悖；也冒犯了我对父亲的记忆，他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在内战中对基督教堂开过火。”

那位官员更用力地挠着脑袋，权衡着选择，且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道夫带着一份蓝色身份证离开部门办公室，证上载明他的民族属性和宗教信仰都是加泰罗尼亚人。

许多年里，道夫都耗费心力不让他的民族和宗教身份对他的女儿们产生不利的影响。他知道以色列的学校教师经常提及“我们犹太人”，尽管事实上他们的一些学生，或学生的父母可能不属于那个群体。在有些时刻，他寻求同西班牙的马兰诺（Marranos）（被迫的皈依者）的一些虚构的关联。但当他的女儿们长大了，并使他确信他作为一名非犹太人没有烦忧到她们，他放弃了那种寻求。

对道夫来说，幸运的是像所有其他以色列人社区一样，基布兹的墓地没有把非犹太人埋葬在栅栏之外或埋在基督徒的公墓中。因此，和基布兹的其他成员一样，道夫被埋葬在了同一块土地上。不过，他的身份证却失踪了，尽管他几乎不可能在他最后的行程中还带着它。

过了一段时间，沙勒克和伯纳多这两位移民，共同拥有了以色列的孙女。她们的父亲是这两位移民的一个朋友。沙勒克和伯纳多的故事在此开始展开。

第二个故事——两位“土生土长”的朋友

第一位马哈茂德（Mahmoud One）（这个故事中的两位主人公名字都是马哈茂德），1945年出生在雅法（Jaffa）。在1950年代的战斗期间，仍有一些阿拉伯人居民区的居民没有逃到加沙（Gaza），且被允许继续生活在他们土生土长的城市中。这位马哈茂德在雅法城贫困的街巷中长大，那里定居的几乎完全是犹太移民。不像在沙伦平原（Sharon Plain）和加利利（Galilee）的移民，雅法的巴勒斯坦人处于人口大大减少和成为孤儿的状况之中；城市的原住民极少有人仍要推进一种独立的文化，而移民社团则拒绝与他们纠缠或与他们整合。

在阿拉伯人的雅法的狭小聚居区，一个出路是加入以色列共产党。年轻的马哈茂德加入了该党的青年运动，在那里他遇到了他同龄的犹太人。这项运动也使他能够好好地学习希伯来语，能够在相当狭小的“犹太人的土地”上游历，并且开始熟悉它。此外，该运动带领他超越了他在

阿拉伯人学校所得到的少量教育。像波兰的沙勒克一样，他研读了恩格斯和列宁的作品，并尝试阅读来自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作家的作品。他的年轻的以色列指导者们喜欢他，他也总是愿意帮助他的同志们。

马哈茂德与一位比他小一岁的犹太男孩成为了朋友。他们观点一致，马哈茂德还帮助他的朋友应对紧张的和具有挑战性的雅法街道的生活。他身强体壮，使那位更年轻的小伙子感到安全，而后者的伶牙俐齿有时也大大地帮助了马哈茂德。他们变得十分亲近，告诉彼此最深藏的秘密。朋友发现马哈茂德梦想被称为摩西，且梦想被接受为男孩子们中的一员。有些夜晚，当他们徘徊街头，马哈茂德自我介绍是摩西，并成功地使货郎们和店主们相信他的犹太人特性。但他不可能长久维持其他身份，总是复回归马哈茂德。他的自尊心也不允许他背叛他的家庭。

身为阿拉伯人，马哈茂德享有一个好处：免服兵役。不过，他的朋友则收到了一份征召通知，这预示着他们之间的分离。1964年的一个周末，他们坐在雅法美丽的海滨，思考着他们的未来。他们自由地想像着，并决定一旦马哈茂德的朋友服完兵役，他们就去游历世界，可能的话，如果幸运他们就不必返回以色列。为了巩固这项重大决定，他们割破手心，并且把它们按在一起，像任何一对质朴的小男孩一样，发誓要一起创造伟大的历程。

马哈茂德等待着那位比他年轻的男人服完他的兵役。这持续了两年半多的时间。但那位朋友复员后却改变了——处于恋爱之中，情感上受到束缚，困惑迷茫。尽管他记得他们的约定，但变得犹疑不决。特拉维夫的蓬勃生机吸引着他。它丰沛的诱惑太过巨大，他难以抗拒。马哈茂德耐心地等待着，但最后不得不承认他的朋友非常依恋于以色列精神的刺激，不能摆脱了。于是，马哈茂德放弃了，他攒钱，而后离开了。他慢慢地穿越欧洲，把以色列越来越远地置于其身后，直到他到了斯德哥尔摩。尽管瑞典有着陌生的寒冷和夺目的白雪，但他仍尽力适应。他开始为一家电梯公司工作，并成为了一位专业安装师。

但在北方漫长的冬日里，他还是会梦到雅法。当他想结婚的时候，他

返回了那曾经是他祖地的地方,但那里的历史已被决定,当他3岁时,那里就不属于他了。他找到了一位合适的女性,带着她回到瑞典,并与她在瑞典组成了一个家庭。从某种角度看,这个来自巴勒斯坦的人变成了一位斯堪的纳维亚人,他的孩子们讲着瑞典语长大了。孩子们将他们的母语教给他们的母亲。很久以前,马哈茂德就停止渴望摩西这个名字了。

另一位马哈茂德1941年出生在阿克里(Acre)附近的一个小村庄。现在,那个地方早已不复存在。1948年,当他随家人逃离战火到达了黎巴嫩,他成为了一个难民,他的出生地被夷为平地。一个繁盛的犹太村庄在它废墟上兴起。1948年战争之后的一年,在一个月黑之夜,马哈茂德和他的家人静悄悄地往回跨越国界,前往在加利利的雅迪达(Jadida)村庄的亲戚家里。这样,马哈茂德成为了许多年里被归为“在场的不在场者(present absentees)”的那些人中的一个——仍旧留在他们出生的国家但却失去了他们的土地和所有权。第二个马哈茂德是一个爱幻想和有天赋的孩子,他的雄辩和想像力过去常常使他的老师和朋友震惊。像第一个马哈茂德一样,他也加入了共产党,且很快作为新闻记者和诗人而在普通党员中成为名人。他移居到海法。那时,海法是以色列最大的犹太人-阿拉伯人混居的城市。在那里,他遇到了以色列的男男女女,他的诗歌吸引的社会人士不断增多。他那首大无畏的诗歌《身份证》(Identity Card),写于1964年,刺激了以色列国内和它疆界之外的整整一代年轻的阿拉伯人。那首诗以对一位以色列内政部官员的庄严挑战开篇:

记下!

我是一个阿拉伯人

我的身份证号码是5500

我有八个孩子

第九个在这个夏天后就会来到

你会生气吗?